

中古时期肥水与巢湖流域连通问题考辨

任超逸

(北京大学历史学系,北京 100871)

【摘要】 本文重点讨论在中古时期是否存在沟通肥水、巢湖两流域河道(包括自然与人工)的问题。《水经注》认为存在,而且不止一条。后人踵其说而不加考察,最终积非成是。本文在仔细梳理历代正史、地理书、古地图和方志的基础上,结合前人研究成果、实地考察资料,主要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实际地理状况两方面进行考证分析,对自《水经注》以来的这种说法加以否定。本文认为在中古时期,肥水、巢湖两流域始终是没能连通的。

【关键词】 肥水 巢湖 施水 将军岭

【中图分类号】 K928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 2096-6822(2020)01-0083-13

古代肥水、巢湖两水系是否连通,也就是在今安徽境内是否存在沟通江、淮的水道(包括自然与人工),这个问题历来受到广泛关注。本文将在仔细梳理文献记载、回顾前辈学者相关讨论的基础上,吸取前人实地考察成果,综合分析地形地貌、气候、水文等地理要素,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一、《水经注》肥、施二水相互连通

今淮河右岸支流东淝河,《水经注》称肥水;巢湖水系支流南淝河,郦氏称施水。《水经·肥水》云:“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。”^①郦道元《注》引吕忱《字林》,“肥水出良余山,俗谓之连枷山,亦或以为独山也”^②。接着又说:“北流分为二水,施水出焉。肥水又北,径荻城东。又北,径荻丘东。右会施水枝津。水首受施水于合肥县城东,西流径成德县,注于肥水也。肥水自荻丘北,径成德县故城西……”^③广阳乡和良余山(连枷山、独山)其他早期史籍中均无记载,具体位置

[收稿日期] 2018-09-29

[作者简介] 任超逸,男,1992年生,北京人,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。

①②③ [北魏]郦道元著,[清]王先谦校:《合校水经注》卷三二《肥水》,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470页。

已不可考。唯成德县,两汉属九江郡^①,晋代属淮南郡^②。今寿县小甸镇筑城村西100米有一城址,平面呈长方形,东西长约600米,南北宽约500米,有夯土城垣。它地处寿县东部,在今瓦埠湖(约相当于肥水故道)东十余千米处,《中国文物地图集》认为这里就是汉代的成德县城^③。如果所说不错,既然肥水先“右会施水枝津”,再“径成德县故城西”,那么两水交汇处就该在此城址以西南的肥水故道上了。考虑到今东淝河中上游处在丘陵区,地势有一定起伏,古今河道应该相差不大,则交汇处就在今瓦埠湖以南的东淝河道附近。

《肥水注》中肥水“北流分为二水,施水出焉”,则施水该是肥水的分流。《水经》又说:“施水亦从广阳乡,肥水别,东南入于湖。”^④《施水注》进一步解释到:“施水受肥于广阳乡,东南流,径合肥县……施水又东,分为二水,枝水北出焉,下注阳渊。施水又东……东注巢湖。”^⑤这表明施水自肥水引出东南流,经过合肥县城后分为两支,主流向东南注入巢湖,支津向北注入阳渊。这条支津应该就是上文提到在荻丘附近与肥水相会的、“首受施水于合肥县城东”的施水支津,只是上面没有提到阳渊。

施水支津除在成德县以南注入肥水外,还有其他分流。肥水过成德县故城西后,“又北径芍陂东,又北径死虎塘东”^⑥,再经过与芍陂“更相通注”的芍陂渎,“又北,右合閤涧水”。这閤涧水“上承施水于合肥县,北径浚遒县西,水积为阳湖。阳湖水自塘西北径死虎亭南,夹横塘西注”^⑦,显然就是施水支津的分流。这里的阳湖,熊会贞认为“即《施水注》之阳渊,酈氏好奇,变文书之耳”^⑧。观下文又称之为“塘”,熊氏此说应当比较合理。浚遒,两汉属九江郡^⑨,晋代改称浚遒,属淮南郡^⑩。今肥东县石塘镇龙城社区周围有一古城址,《中国文物地图集》标为浚遒^⑪,与历代地理总志所指方位相合,应当可信。

由以上所引记述可知,《水经注》中肥、施二水的分合关系相当复杂。首先二水同源,在广阳乡附近分流,肥水向北,施水向东南。施水流经合肥后再分流,主流向东南注入巢湖,支津向北。施水支津又分流,分别在荻丘和横塘附近(此支又称閤涧水)注入肥水。为了形象直观地理解这些记载,可以适当参考杨守敬编绘的《水经注图》^⑫(图1)。这里需要指出杨图的几点问题。第一,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施水支津和閤涧水是在阳湖(或称阳渊)分流的。第二,图中肥水的流向在死虎塘附近至黎浆水口一段,与今东淝河不很一致。上文已经指出,这一带是略见起伏的丘陵地形,古今河流走向应该不会相差太大。但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,主要的分合状况以及五个重要节点杨图都呈现出来了,很有意义。

① 《汉书》卷二八上《地理志上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1569页;《续汉书·郡国志四》,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5年版,第3485—3486页。

②⑩ 《晋书》卷一五《地理志下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460页。

③ 国家文物局主编: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安徽分册》下册,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版,第196页。

④⑤ [北魏]酈道元著,[清]王先谦校:《合校水经注》卷三二《施水》,第473页。

⑥⑦ [北魏]酈道元著,[清]王先谦校:《合校水经注》卷三二《肥水》,第470页。

⑧ [北魏]酈道元注,[清]杨守敬、熊会贞疏,段熙仲点校,陈桥驿复校:《水经注疏》卷三二《肥水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,第2676—2677页。

⑨ 《汉书》卷二八上《地理志上》,第1569页;《续汉书·郡国志四》,第3486页。

⑪ 国家文物局主编: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安徽分册》上册,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版,第114—115页;国家文物局主编: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安徽分册》下册,第14页。

⑫ [清]杨守敬编绘:《水经注图(外二种)》,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349、377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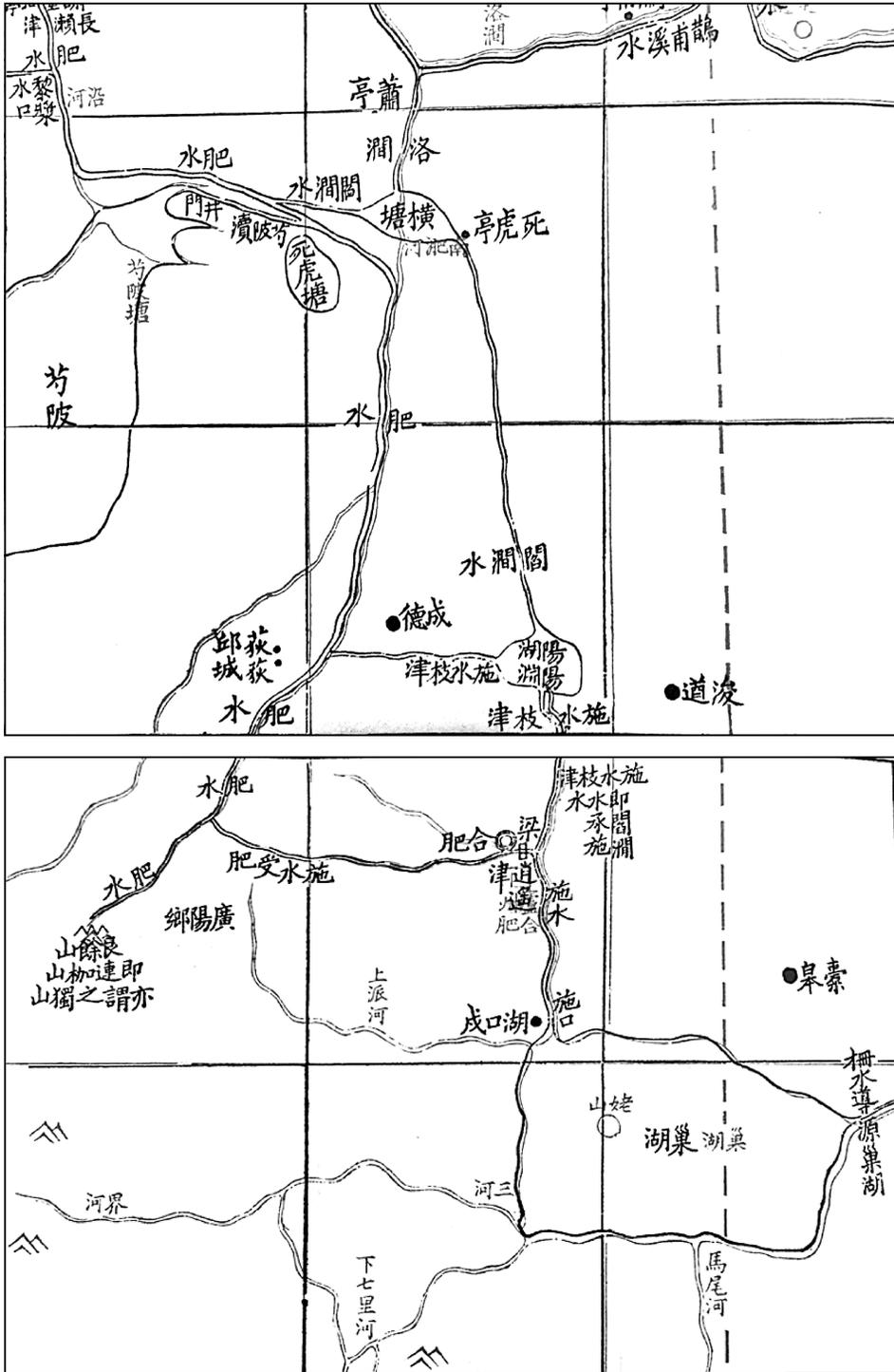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杨守敬《水经注图》中有关肥水、施水的部分
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杨守敬编绘：《水经注图（外二种）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349、377页。

二、后人对《水经注》所谓肥、施共同源头与分水处的不同理解

《水经注》的记载看似如此详密,以至于几乎所有古代学者都对肥、施二水具有共同源头深信不疑。他们将两水的共同源头与分水处定位到当代地理坐标上,其中尤其关注源头的所在地,以试图证明《水经注》记载的正确性。本节将介绍其中四种主流看法,并辨析它们是否合理。

1. 大蜀山发源说

以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引述的一种说法为代表。其文曰:“吕忱《字林》:‘……或以为独山’,即今庐州府西二十里之大蜀山也。”^①这种说法应该是受到了《尔雅》的影响,其《释山》篇曰:“独者,蜀”,郭璞注云:“蜀亦孤独。”^②用这来解释大蜀山的命名原则是可以的,因为它确实是孤立的,与其他山不相连属。但因此就说肥水发源于大蜀山,是荒唐的。考大蜀山在今合肥市西郊董铺水库南数千米处。这一带总的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,古代也应该无大的差异,发源于这里的河流(假如有的话)必然向东南流入巢湖,怎么可能另一支向北流入淮河呢?

2. 紫蓬山发源说

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引《中都志》《南畿志》都持此说。前者曰:“肥水出紫蓬山,经合肥城下”^③,后者云:“肥水出府西南七十里之紫蓬山。”^④不论此肥水指北流之肥水,还是东南流之施水(古代多有称今南淝河为肥水者),还是二者的合流区段,都是不可能的。清末马其昶在其《游紫蓬山记》一文中就已明确指出:“兹山之水皆东南入巢湖,无能西北逾山而过”^⑤,情况与大蜀山相似。今紫蓬山北麓属派河流域,在南淝河之南,于此发源之水流经合肥尚不可能,向北流入淮河更属无稽之谈。另《太平寰宇记》,“肥水出县(笔者按:指合肥县)西南八十里蓝家山”^⑥。可能是因为“蓝家”与“连枷”音近,才有此说。虽不知这座山的确切位置,但既然位于合肥西南,情况当与紫蓬相似。

3. 鸡鸣山发源说

此说以唐代卢潘为代表,他在宣宗大中年间曾做过庐州刺史^⑦,其《庐江四辩》一文提到:

肥水出鸡鸣山,北流二十里,所分而为二:其一东南流经合肥县南,又东南入巢湖;其一西北流二百里,出寿春,西投于淮。二水皆曰肥……是山也,高不过百寻,所出唯一水,分流

①④ [清]顾祖禹撰,贺次君、施和金点校: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一九《南直一》,中华书局2005年版,第891页。

② [晋]郭璞注,[宋]邢昺疏,[清]阮元校刊:《尔雅注疏》卷七,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2618页。

③ [清]顾祖禹撰,贺次君、施和金点校: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二六《南直八》,第1274页。

⑤ [清]马其昶:《游紫蓬山记》,《抱润轩文集》卷九《杂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57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732页。

⑥ [宋]乐史撰,王文楚等点校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二六《淮南道四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2492页。

⑦ [宋]王象之:《舆地纪胜》卷四五《庐州》,中华书局1992年版,第1843页。

而已。其源实同，而所流实异也……^①

这段话，在《舆地纪胜》及之后的地理志书中多有引用。^② 北宋朱服亦有诗云：“鸡鸣分水绕肥城。”^③ 鸡鸣山，《方輿胜览》谓“在合肥县西北四十里”^④。今肥西县北部南淝河董铺水库以上河段的西南侧有鸡鸣山，距合肥市正好 20 千米左右，应该就是卢潘所指。此山地处南淝河流域的最西端，再向西数千米越过一较高冈地即可到达东淝河流域，显然这种说法较之前两种更为可靠。但鸡鸣山毕竟位于江淮分水岭以南的南淝河流域，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，所谓发源于此地的肥水只能向东南流，不可能向北“二十里”后再分流。就算当地地形能支持它向北流，但北流二十里后无论如何也是位于江淮分水岭以北了，便不可能再产生向南的分流。因此鸡鸣山说也是不准确的。此外，光绪《重修安徽通志》说肥水发源于紫蓬山，经过鸡鸣山后再流到合肥。^⑤ 如上所述，合肥以西、以北地区地势均自西北向东南倾斜，河流是无法从紫蓬山流到鸡鸣山的。

4. 将军岭发源分水说

自鸡鸣山向西，有地名曰将军岭，正为当今东淝、南淝间之分水岭。道光《寿州志》就说《水经注》所指的分水处广阳乡，就是当时的将军岭，其地“有分水田，肥水施水皆从此出，肥水西行，施水东流”^⑥。清末民国时的马其昶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，他说：“肥水实出将军岭，在紫蓬北六十里，自岭以西之水入寿春者，为注淮之肥；其东流十里经鸡鸣山绕郭迤南入湖者，今亦曰肥河，酈道元谓之施水也……良余山即将军岭。”^⑦ 杨守敬也提到过这种说法，谓：“今有将军岭在合肥县西四十五里，或云即广阳乡。”^⑧ 因为地处现长江、淮河两大流域的低矮分水岭，如果两水有共同源头的话，将军岭则可能成为自然的分水处，或经人工改造后将两水系连通。对于此地，后文还将详加探讨。

三、现当代学者的讨论：对是否沟通的不同看法

南北朝以后的学者，大多对《水经注》肥、施同源分流的记载深信不疑。至《舆地纪胜》所引《无为军图经》，虽然已经意识到当时的肥河“不复通于巢湖”，但仍然认为“古巢湖水北合于肥河”，只是“厥后肥河堙塞”^⑨。同书引赵氏《舆地考》也说：“古巢湖北流合于肥河，今堙矣……是川陆之不常，未易以今论也。”^⑩ 按赵氏可能指赵善誉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史部著录有赵善誉《读史

① [宋]姚铉：《唐文粹》卷四六《古文戍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集部第 1343 册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，第 659 页。

② [宋]王象之：《舆地纪胜》卷四五《庐州》，第 1824—1825 页。后代志书所引，不再一一列举。

③ [宋]王象之：《舆地纪胜》卷四五《庐州》，第 1846 页。

④ [宋]祝穆，[宋]祝洙增订，施和金点校：《方輿胜览》卷四八《淮西路》，中华书局 1992 年版，第 848 页。

⑤ 光绪《重修安徽通志》卷二九《舆地志》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省志辑·安徽》第 1 册，凤凰出版社 2011 年版，第 309 页。

⑥ 道光《寿州志》卷四《舆地志下》，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》第 25 册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年版，第 168 页。

⑦ [清]马其昶：《游紫蓬山记》，《抱润轩文集》卷九《杂记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 1575 册，第 732 页。

⑧ [北魏]酈道元注，杨守敬、熊会贞疏，段熙仲点校，陈桥驿复校：《水经注疏》卷三二《肥水》，第 2674 页。

⑨⑩ [宋]王象之：《舆地纪胜》卷四五《庐州》，第 1824 页。

輿地考》六十三卷,又名《輿地通鉴》。^①据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记载,赵善誉在南宋淳熙年间曾著《南北攻守类考》,其内容主要是“三国六朝攻守之变,鉴古事以考今地,每事为之图”^②。这两本书的主题都是古代沿革与军事地理,著者赵善誉很可能就是同一人。而《輿地考》,应该就指《读史輿地考》。如果所论不误,与《无为军图经》一样,这也是宋代的说法。以后的志书,往往盲目认同《水经注》的说法,而论水源与分水处所在,歧互参差,已见上文,兹不复述。

至20世纪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,学术界针对此问题出现了第一次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讨论。其代表有杨钧发表于1958年的《巢肥运河》^③,1959年杨国宜的《从“合肥”到肥合——沟通江淮的水道》^④,以及1960年刘彩玉的《论肥水源与“江淮运河”》^⑤。他们都认为存在沟通肥水与巢湖两流域的水道,只是对它的称呼不同,在到底是自然形成还是人工修凿方面也略有分歧。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就是大量罗列明清时期地方志的相关记载,却缺乏对它们的考辨分析。所援引的几处早期史料,也模糊不清,无确凿证据证明其观点。此外,引发这次讨论的还有现实需求的推动,即所谓重新沟通江淮水运的构想。刘彩玉更明确表示,他的写作意图就是“给予安徽省交通、水利部门在开发新的航道和新的水利灌溉系统提供历史证据和线索”^⑥。此次讨论发生于1958—1960年间,一些观念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学术界,因而这几篇文章的论述过程和结论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。

第二次讨论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。代表性论文有金家年的《肥水源流探微》^⑦(1983年)、《江淮水道疏证》^⑧(1984年)、《肥水流向的历史变化》^⑨(1988年)及朱更扬的《江淮运河问题辨证》^⑩(1987年)。与前次不同,这次讨论仅仅局限在学术层面,如金家年就说:“本文旨在说明肥水尤其是南淝河的源流行径,以求得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。至于肥水源流的变化对江淮地区工农业生产,尤其是对合肥城市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提供科学根据,则当另著文研讨了。”^⑪在核心观点上,金家年认为存在天然形成的沟通水道,朱更扬则认为无论自然形成抑或人工开凿,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同上一时期的论文一样,金文的结论大多来自主观臆测,缺乏对史料的考证。相比起来,朱文虽然也存在一些缺陷,但其考据相对精审,推测较为合理,尤其是首次明确提出不存在所谓江淮运河,实属难能可贵。近些年,张文华在其所著《汉唐时期淮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》一书中认为,“(笔者加:指寿春)东北又有肥水自南而北注入淮水,则沿着肥水可达合肥,再经巢肥运河、濡须水抵长江”^⑫,连所谓巢肥运河可能存在的大致方位都搞错了(当在合肥北,不当在南),显然没有经过仔细研究。

① 《宋史》卷二〇三《艺文志二》,中华书局1977年版,第5099页。

② [宋]陈振孙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一《易类》,清武英殿聚珍版,第26a页;同书卷八《地理类》,第41a页。

③ 杨钧:《巢肥运河》,《地理学报》1958年第1期。

④ 杨国宜:《从“合肥”到肥合——沟通江淮的水道》,《安徽史学通讯》1959年第3期。

⑤⑥ 刘彩玉:《论肥水源与“江淮运河”》,《历史研究》1960年第3期。

⑦⑪ 金家年:《肥水源流探微》,《安徽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1983年第1期。

⑧ 金家年:《江淮水道疏证》,《安徽史学》1984年第3期。

⑨ 金家年:《肥水流向的历史变化》,《安徽师大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1988年第3期。

⑩ 朱更扬:《江淮运河问题辨证》,《安徽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1987年第4期。

⑫ 张文华:《汉唐时期淮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》,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,第394页。

现当代学者在论证存在所谓沟通水道的过程中,经常引用以下几条史料。但这些记载往往不能证明其观点,或者是模糊不清的,现分述如下:

(1)《尔雅·释水》篇“归异出同流,肥”^①。《诗经·泉水》篇“我思肥泉,兹之永叹”下毛亨传云“所出同、所归异为肥泉”^②。这是经书对“肥”所做的一种解释,肥水名“肥”,再加上《水经注》的记载,后人至少比较容易相信肥、施二水曾经的同源异流的。但肥水之“肥”是否真的就是这个意思,或者说即便早期命名时确取此义,但当时的命名是否真正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,就不得而知了。

(2)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“合肥受南北潮,皮革、鲍、木输会也”,裴骃《集解》解释说:“言江淮之潮,南北俱至庐州也。”^③《汉书·地理志》略有不同,谓“寿春、合肥受南北湖皮革、鲍、木之输,亦一都会也”^④。有了裴骃的诱导,部分学者理解为先秦秦汉时期,在这一地区存在沟通江、淮两大流域的水道。如嘉庆《庐州府志》就认为“芍陂……堰水为湖,以资蓄泄,故能使肥水、閻涧、施水合达巢湖”^⑤。又如在《将军岭古“江淮运河”的考察及发现》一文中,作者就认为“在先秦时期,淮河、长江流域的水位较高,在两条肥水源头处……是可以通航的”^⑥。假如芍陂、淮河、长江的水位真的可以高到将军岭所在的那处江淮分水岭,就需要 50 多米的海拔,这样的话,整个江淮丘陵,包括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大部分,不都被洪水淹没了么?如果水位高不到这种程度,仅仅比现在高一点,那又对两大水系的连通有什么帮助呢?且两汉以来合肥城始终存在,并没有看到关于其受到巢湖波及的记录,因此海拔高于合肥的江淮分水岭,更不可能与巢湖产生直接关系。根据当代地理学和地质学研究,进入人类历史时期以来,巢湖范围最大就是在商代,当时的湖泊轮廓位于 10 米等高线附近^⑦,这与江淮分水岭附近 50 余米的海拔相距甚远,因此中古时期的巢湖无法实现与肥水流域的连通。事实上,这种认为长江、淮河水位降低导致连通水道中断的想法,都是不合乎逻辑的,更是与地理现状相违背的。至于《汉志》中的“南北湖”,金家年说是指南面的巢湖和北面的瓦埠湖^⑧,这也是不可能的。《中国历史自然地理》一书明确讲到,明清两代“洪泽湖基准面抬高后,淮水干流上游坡降减弱,各支流排入淮河的水流在汛期往往因去水不畅而出现倒灌,溢于两岸。长久不退,田地淹没,逐渐形成湖泊……在南岸有寿县以东肥水下游壅塞而成的瓦埠湖”^⑨。“南北潮”和“南北湖”分别是什么意思,哪个是更原始的记载不得而知。但无论如何,似乎都不能确切得出肥、施通流的结论。

(3)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载,“(建安)十四年春三月,军至谯,作轻舟,治水军。秋七

① [晋]郭璞注,[宋]邢昺疏,[清]阮元校刊:《尔雅注疏》卷七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2619 页。

② [汉]毛亨传,[汉]郑玄笺,[唐]孔颖达等正义,[清]阮元校刊:《毛诗正义》卷七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 309 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一二九《货殖列传》,中华书局 1959 年版,第 3268 页。

④ 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下》,第 1668 页。

⑤ 嘉庆《庐州府志》卷三《山川志下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安徽府县志辑》第 1 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,第 54 页。

⑥ 马骥、高韵柏、周克来:《将军岭古“江淮运河”的考察及发现》,《安徽水利史志通讯》1987 年第 3 期。

⑦ 王心源:《巢湖北山地质考察与区域地质旅游教程》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,第 96 页;吴跃东:《巢湖的形成与演变》,《上海地质》2010 年第 C1 期,第 155 页。

⑧ 金家年:《肥水源流探微》,《安徽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1983 年第 1 期。

⑨ 邹逸麟、张修桂主编:《中国历史自然地理》,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,第 265 页。

月,自涡入淮,出肥水,军合肥”^①。此次出征,日后的魏文帝曹丕跟随,并作有《溯淮赋》(一说《浮淮赋》)^②,未涉及相关内容。陈寿行文,务求简洁,皇帝本纪部分更该如此。因细节未明,姑且存疑。

(4)《梁书·夏侯亶传》的记载。普通六年(525年),梁大举北伐,遣裴邃率领诸将“自南道伐寿阳(笔者按:寿阳即寿春,东晋避讳改)城,未克而邃卒”,既而“加亶使持节,驰驿代邃……相拒,频战克捷。寻有密敕,班师合肥,以休士马……七年夏……通清流涧,将入淮、肥,魏军夹肥筑城,出亶军后,亶与僧智还袭,破之。进攻黎浆……”^③黎浆是肥水下游左岸地名,在寿阳城以南。夏侯亶自合肥进攻寿阳,该是由南向北行军。或以为“通清流涧”即是开凿沟通肥、施两水系的运河,“清流涧”仅见于此处记载,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。至于在短期内修建这类运河是否可能,后文将予以提示。

(5)唐德宗时,田悦、李惟岳、李纳、梁崇义藩镇割据,朝廷“举天下兵讨之,诸军仰给京师”,这时南北漕运通道中断,京师大恐。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认为:

秦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,绝蔡河,至陈州而合,自隋凿汴河,官漕不通,若导流培岸,功用甚寡;疏鸡鸣冈首尾,可以通舟,陆行才四十里,则江、湖、黔中、岭南、蜀、汉之粟可方舟而下,繇白沙趣东关,历颍、蔡,涉汴抵东都,无浊河溯淮之阻,减故道二千余里。^④

后“会李纳将李洧以徐州归命,淮路通而止”^⑤。在以往南粮北运通道全部受阻的情况下,杜佑提出了新的方案,分为河—淮、江—淮两段。河、淮之间,东部的汴河不通,那就选择西部的秦汉旧运路,即从大河南分的汴河入琵琶沟,经蔡河至陈州入颍水,在寿州略西处入淮水。与之相对应,江—淮段就选择经过东关(具体位置详下,在巢湖通长江的濡须水上)的肥水—施水—巢湖—濡须水一线^⑥。鸡鸣冈,《宋史》称鸡鸣山^⑦,该与卢潘所称鸡鸣山同为一地。杜佑认为“疏鸡鸣冈首尾,可以通舟,陆行才四十里”,也就是说即便河道经过整治,这处分水岭附近的四十里还是需要陆运。杜氏所言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生死存亡,该不会有误。这很清楚地表明,唐代是不存在所谓沟通肥水与施水之水道的。至于前代的情况,这段文字未能提供有效信息。

除上面提到的这些史料之外,早期的历史地图或许也能为讨论此问题提供一些线索。通过对宋元舆图的梳理,对于肥水、巢湖两流域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表示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。第一种是两水系各自向南、北流入长江、淮河,并没有连通,如南宋上石于苏州的《地理图》^⑧、南宋末年

① 《三国志》卷一《魏书·武帝纪》,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32页。

② 《沂淮赋》说,见〔唐〕虞世南辑:《北堂书钞》卷一三七《舟部上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子部第1212册,第3页;《浮淮赋》说,见〔唐〕欧阳询:《艺文类聚》卷八《水部上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子部第887页,第292页。此外《初学记》《太平御览》皆有引,“溯”“浮”不一。

③ 《梁书》卷二八《夏侯亶传》,中华书局1973年版,第419页。

④⑤ 《新唐书》卷五三《食货三》,中华书局1975年版,第1369页。

⑥⑦ 《宋史》载张洎追述此事,曰“庐、寿间有水道,而平冈巨其中,曰鸡鸣山……”,所叙更明。见《宋史》卷九三《河渠三》,第2320页。

⑧ 曹婉如等编:《中国古代地图集(战国—元)》,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,图版第70—72页。

绘制而拓本现存日本的《舆地图》^①。第二种是肥、施二水同源分流,肥水向北流入淮河,而施水向南入巢湖,复自巢湖北出汇于肥水,并无入长江者,如伪齐阜昌七年(1136年)上石的《禹迹图》。^②第三种是肥水向北流入淮河,施水并没有画出,而巢湖直接向北流入肥水者,如南宋绍兴十二年(1142年)上石于镇江的《禹迹图》。^③第四种是巢湖向南通过一条河流与长江连通,又向北通过另一条河流与淮河连通,无法判断水流走向,如收入宋代《历代地理指掌图》中的《帝眷九州之图》和《唐一行山河两戒图》。^④第五种是肥、施二水同源分流,而后肥水向北注入淮河,施水汇入巢湖,而后再流入长江,如收入《春秋分记》的《王畿列国指掌图》。^⑤

以上五种情况中,从江、淮两大流域是否连通来看,没有连通的是第一种,相互连通的是第四种和第五种,而第二种和第三种把巢湖水系也当作是淮河流域的一部分,因此也算是没有连通。但从肥水、施水是否同源分流的角度看,肯定此观点的有第二种和第五种,没有表现出的是第一种、第三种和第四种。因此古代舆图所表现出的情况,可谓是“言人人殊”。其中如第三种和第四种甚至将巢湖水系完全算作淮河流域的一部分,与所有传世的文献记载都是矛盾的,也与历史上这一带的地势相违背,因此其可靠性值得怀疑。总之,对于古地图的考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帮助,至少没法证明古代肥水、巢湖两流域是相互连通的。

四、将军岭渠道遗迹概况：从地形地貌视角否认曾经存在沟通肥、施(肥、巢)的水道

既然从文献记载中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,不妨尝试运用地理学的基本知识解决这一问题。

首先来看有没有可能存在天然水道沟通江、淮。与河、淮间广袤的大平原不同,江淮西部主要是低山、丘陵区,江、淮两大流域之间存在分水岭(或称分水线),地势自中间向南北两侧倾斜。在本文涉及的这一地区,也就是东淝河与巢湖流域的分水岭。它自今六安市略东南起,先向东、后向东北方向延伸,虽有波折,却从未中断。^⑥ 尽管古今地貌存在差异,但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时期内,这样的宏观地貌形态不会有太大变化。也就是说,古代也存在这样一条江淮分水岭(分水线),其北侧河流注入淮水,南侧河流注入江水。而且,不光肥、施二水间不可能存在天然的共同源头,就是所谓施水支津的流向也是与大地势完全违背的。因为合肥地处分水岭南侧,地势北高南低(而且坡度比较明显),今天这一带的四里河、店埠河等都是自北向南流入南淝河,在古代也不可能存在向北流的施水支津。《水经注》对这一带的记述是不

① 曹婉如等编:《中国古代地图集(战国—元)》,图版第82—83页。

② 曹婉如等编:《中国古代地图集(战国—元)》,图版第54—56页。

③ 曹婉如等编:《中国古代地图集(战国—元)》,图版第57—59页。

④ 曹婉如等编:《中国古代地图集(战国—元)》,图版第96、98页。

⑤ 曹婉如等编:《中国古代地图集(战国—元)》,图版第123页。

⑥ 《中国河湖大典》编纂委员会:《中国河湖大典·淮河卷》书后附图“淮河流域图”,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年版;《中国河湖大典》编纂委员会:《中国河湖大典·长江卷》书后附图“宜昌—河口干流区间水系图”,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年版。

准确的。

那么是否存在人工修凿沟通江淮的渠道呢?在讨论之前,应该知道修筑这种渠道的两个前提条件。其一,要在相邻两大流域中分别选择相互距离最短的一条支流(此地区应该选择江水、淮水的支流各一条)。其二,应该选择在分水岭(分水线)上海拔较低处修凿渠道,从某流域的支流引出渠道,使水流到达另一流域的支流,最大程度降低河道比降和行船难度,人为地造成“同源异流”(如灵渠就是如此)。前面提到的将军岭就是最满足这样两个条件的地方,其地高程只有50余米,低于分水线上的其他地方,且离东面的南淝河支流与西面的东淝河支流相距不远。

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,笔者没有能到这一带亲自考察。但是,20世纪80年代后期几位当地学者就在这一带发现了运渠遗迹。通过他们的考察报告了解情况,再结合地面高程、卫星影像等资料加以分析,也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。

现将考察报告中的重要内容抄录于下:

1. 鸡鸣山北麓古坝(简称“鸡鸣坝”)

坝南连鸡鸣山,北接一小岗头。坝长约560米,净高13米(坝顶高程43.2米)。内坡坡比约为1:1.5……分层筑压的土层阶痕仍清晰可辨。外坡较缓……坡比约为1:2.5。从地形上看,此坝正好横截南淝河支流,与岭(笔者按:指西面的将军岭)上的“曹操河”遥遥相对,其筑坝拦水,抬高水位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……可以确定它是一座人工筑成的古坝。坝北端的岗头旁有一狭窄缺口为溢洪道,坝内洪水可经此流入南淝河。坝的外坡下有一口大塘,群众称“大陂”……我们估计是筑坝取土区,因挑挖下陷而成。“大陂”东连“小陂”(群众语),两边堤坝平直,中间呈人工河形,长约300米,宽100米,下接南淝河。“小陂”……呈西高东低的缓坡形,高程30米左右。

2. 将军岭附近的“曹操河”

位于肥西县将军岭乡中部,呈东西向,全长五公里……西起东淝河支流王桥小河源头的东岳庙附近(高程47米),经皂角树郢、小油坊郢,紧贴将军岭街而过,在凤凰墩处越过江淮分水岭(墩上高程73.2米,河底高程52米),至二龙戏珠,到四十坎(罗郢)止(高程降至40米以下)……随地面高程变化可分为明显的两段。

西段:从东岳庙到将军岭街东,长2公里。其中,起点东岳庙至皂角树郢约1公里的河道已被淠史杭工程淠河干渠利用,重合为一。从皂角树郢到将军岭街东的一公里河道遗迹仍模糊可辨。中间河床平直,宽百余米,高程在52米左右……两边旧堤遗迹仍断续可见……在小油坊郢西,仍留有一段叫“长塘”的古河遗迹,长约200米,宽约50米。

东段:从将军岭街东至四十坎下(罗郢),长约3公里,为高切岭,工程巨大,最深处由河底到堤上有20米。坡比约1:3,河底宽70—80米,较平直。河底最高处(凤凰墩下河底)高程52米,向东渐降到45米以下……群众所称的曹操河到四十坎就终止了。此下可利用“鸡鸣坝”抽截南淝河支流形成约1.5公里长的河道。^①

为便于读者理解,提供三张卫星影像图(图2—图4),并对相关要素进行标注。

^① 马骥、高韵柏、周克来:《将军岭古“江淮运河”的考察及发现》,《安徽水利史志通讯》1987年第3期。



图2 将军岭渠道及鸡鸣坝遗迹卫星影像图(西段)

资料来源:卫星影像底图来自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“天地图”,网站 <http://map.tianditu.com/map/index.html>,安徽省测绘地理信息局,下两图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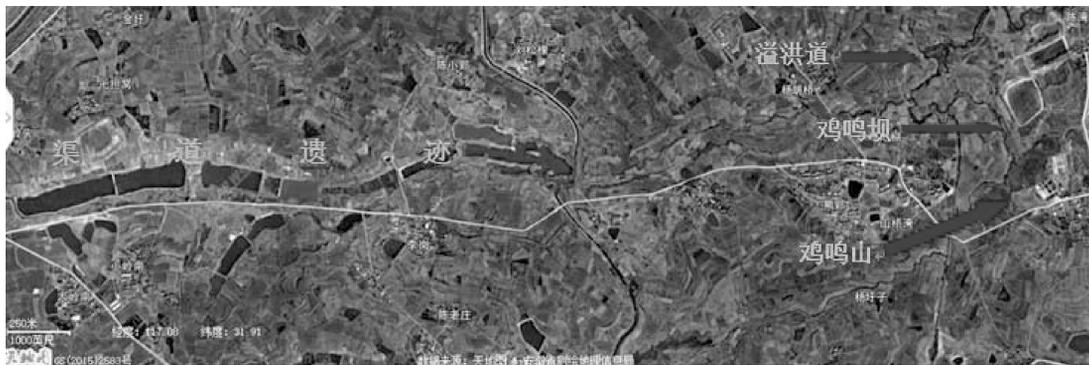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将军岭渠道及鸡鸣坝遗迹卫星影像图(东段)

图3中的鸡鸣山,即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及。嘉庆《庐州府志》说它“高不过百寻”^①,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。嘉庆《合肥县志》中提到肥水(此处应指施水)“源出将军岭分水田,东流……东行十里,过鸡鸣山北”^②,应该指的就是这条渠道。但很明显,此处渠道遗迹跨分水岭东西两侧,地势中间高两端低。由于坡降太大,雨水无法存蓄(卫星图中显示有水是因为已经分段筑堤。而在古代,即便修建多处船闸,也无法解决峰脊处的水源问题),这种倒“V”字型走势的渠道又得不到来自天然河流的水源补给,因而根本无法通行。古代的渠道设计者不该不明白这最基本、最浅显的道理,因而考察者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,是比较合理的。忽略一两千年来的水土流失与堆积、沉积,这一带的古今地势应该相差不多。考虑到渠道西端的东岳庙高程为47米,东端的鸡鸣坝顶高43米,坝高13米。那么最初的设计意图显然是从西面的肥水支流向渠道内引水,在渠道东端筑坝蓄水,控制河道比降和流速,于坝两侧卸货转运,从而进入施水流域。考察者认为现存渠道过宽(七八十至百余米)是未完工的一个证据^③,

① 嘉庆《庐州府志》卷一《沿革志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安徽府县志辑》第1册,第25页。

② 嘉庆《合肥县志》卷四《山水志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安徽府县志辑》第5册,第51页。

③ 马骥、高韵柏、周克来:《将军岭古“江淮运河”的考察及发现》,《安徽水利史志通讯》1987年第3期。



图4 将军岭渠道及鸡鸣坝遗迹卫星影像图(图3东端放大)

笔者认同这一说法。未完工的原因,可能是工程太过艰巨,如上述东段最深处由河底到堤上有20米,这样大的土石方作业量在古代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除此以外,可能还有地质方面的原因。据相关钻探资料,“最高处(凤凰墩下)在47米高程处出现‘极坚’土质,42米高程处出现砂岩”^①,或许也是个重要原因。

虽然此处渠道遗迹的确切年代还不得而知,但就是在这样“最理想”的条件下,运渠仍未修通,那么由于江淮丘陵地区地形条件不佳,所谓“巢肥运河”“江淮运河”从未存在过,就是无可怀疑的了。考察者们已经获得了如此丰富的勘察资料,却又得出“‘江淮运河’……是沟通江淮的重要水路”^②这般结论,实在令人惋惜。

五、对在肥、施二水上游实施大规模 航运可行性的探讨

由以上论述可知,不管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修筑,肥、施二水从未连通。再进一步讲,它们的

①② 马骥、高韵柏、周克来:《将军岭古“江淮运河”的考察及发现》,《安徽水利史志通讯》1987年第3期。

上游河段从自然条件来说,都是难以进行大规模航运的。古代南北分裂割据时,这一带是军事要地。如果用水路运兵及粮草辎重,那么必须考虑到军用船只可观的重量、排水量及吃水深度,这对河道比降、流量、深度的要求就很高。而肥、施二水的上游河段,恰恰不能满足这些需求。这里以低山丘陵为主,“河床比降大,水流湍急”^①,加之流域短小,河道不能起到很好的存蓄水量效果。

这一带河流主要由雨水补给,因而其径流量的年内变化与降水量的年内变化密切相关。江淮属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,降水量季节分配不均,70%以上集中在4—9月份,夏季6—8月更占到全年的40%以上。^②与此相应,夏季河水量较多,占全年的50%左右,春季30%,秋冬不足10%。^③这样,冬半年长时间缺乏有效补给,夏半年本多降雨,却由于河道比降大,加剧了暴涨暴落的水文特点。再考虑到河道上游支流较多、水量较小、坡度更大,这种特点就更加显著了。可以说,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,肥、施二水上游的航运条件都是不很理想的。道光《寿州志》中提到肥水(今东淝河)自合肥县发源后,直到进入寿州境内“始能通舟”^④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上文已经指出,此类人工渠道修筑需要具备某些条件。如果有“同源异流”这样的先天优势,那么为了航运而修筑的连通渠道,最好就是在天然沟通点处开展工程。但在将军岭这样条件优越的地方,有尝试修筑人工渠道的努力,但没有成功。此外在将军岭及其附近,也丝毫没有能够反映天然沟通水道存在的迹象。至于走向与“施水支津”南段相似的四里河、店埠河等巢湖北岸支流,一是北面没有对应的河流可供连通,二是水流量有限,三是没有发现尝试开凿渠道的遗迹,因此在这一带存在“同源异流”或人工渠道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。而且事实上,我们从相关史籍中确实找不到在这一地区采用水运的明确记载。一方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位于江淮东部水运条件较好的邗沟(即扬楚运河)却史不绝书。这当然不是偶然,而是由客观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。

其实,如上文提到的《舆地纪胜》和明清地方志的编纂者已经处在一种两难的困境。一方面,他们相信《水经注》等经典著作的记载,因此他们在志书中对这些“同源”“分流”的说法加以继承,并尽可能对应到当代地名上。另一方面,他们也很清楚当时的肥水、巢湖两大水系是不能连通的,即“淮肥不通于巢湖”“今肥水绝不与施水会”^⑤,因此又会对当时的情况如实加以记述。对于这种矛盾,修志者往往用“陵谷易处”^⑥等原因加以解释。但在一两千年的时段内,这一带地形的变化应该是微乎其微的。大多数前代学者往往拘泥于史籍的记载,缺乏相应的考辨分析,又不能把这些地理要素考虑进来,就只能与历史的真相渐行渐远了。

① 张修桂:《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,第354页。

② 丁一汇主编:《中国气候》,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,第410页。

③ 《中国河湖大典》编纂委员会:《中国河湖大典·综合卷》,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年版,第48页。

④ 道光《寿州志》卷四《舆地志下》,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》第25册,第168页。

⑤ 嘉庆《庐州府志》卷三《山川志下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安徽府县志辑》第1册,第54页;道光《寿州志》卷七《水利志》,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》第25册,第321页。另如嘉庆《合肥县志》卷一《图说》提到所谓“施水支津”虽然“距西肥河独不甚远”,但“今为龙干所隔,无西合之理”,因此对于《水经注》的记载“姑存其说”,见第19页。又如道光《寿州志》卷四《舆地志下》说鸡鸣山北又土山“以北之水,俱由肥入淮,山水皆由施水入巢湖,其间俱为高冈所限……閼洞水无上承施水之理”,见第170页。

⑥ 嘉庆《庐州府志》卷二《山川志上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安徽府县志辑》第1册,第32页。